

計 划 时 代

(美) 劳 文 著

資料室

商 务 印 書 館

計 划 时 代

〔美国〕劳 文 著

黄 公 度 譯

潘 源 来 校

商 务 印 書 館

1959 年 • 北京

Lewis L. Lorwin
TIME FOR PLANNING
New York, 1945

出版說明

“计划时代”是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劳文 (Lewis L. Lorwin) 的一部主要著作。书中收集了他从1931年到1944年所写的十几篇论文，他从计划种类、美国计划、工人与计划和国际计划等方面叙述了他的“计划理论”。

劳文是美国“计划化运动”的倡始人，他一貫站在反动的立場为壟断資本和美帝侵略政策服务。本書是一本徹頭徹尾的反馬克思主义、反工人运动的反动著作。本館出版这本书，是供我国学术界批判这一反动思想作参考之用的。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107号)

新 华 书 店 总 經 售

北 京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統一書号:3017·9

1950年2月初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5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書數 207千字
印張 7—12/16	字數 1—2,000,000
定價 (9) 1.10	

为壟断資本服务的劳文及其“計劃时代”

路易斯·劳文(Lewis L. Lorwin)是美国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計劃化运动”的倡始人，他一貫站在反動的立場为壟断資本服务。二次大战期間，劳文在美国壟断資本集团的賞識下，多次出任要职，1941年至1942年，任美国經濟作战局和国家資源計劃局顧問；1943年又改任国外經濟管理局顧問，战前还充当过日内瓦国际劳工局的顧問。劳文就是这样以壟断資本的策士的身分，到处为美帝国主义的擴張和侵略政策尽忠効力的。在此期間，他著过好幾本書。“計劃时代”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此外还有：“苏联經濟和社会發展的現阶段”(Present Phas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U.S.S.R.)、“經濟計劃問題”(The Problem of Economic Planning)、“联合国的战后計劃”(Post-war Plans of United Nations)和“第二次大战的經濟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等書。

劳文在他的著述上，冠上“計劃”字样，侈談他的所謂“計劃化理論”，这并不是偶然的。我們知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計劃的結果，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宏偉的成就，苏联社会主义建設飞跃發展的事实，在資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中發生了極其深刻的影响，特別是苏联在1930年消灭了資本主义制度遗留下来的失业現象，劳动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更使資本主义国家的無产階級大为鼓舞和向往，广大被压迫、被剝削的劳苦大众日益認識到社会主义制度比資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壟断資本集团懾于苏联的强大和国内工人的

覺醒，便雇用了他們的一批策士，对苏联进行百般的污蔑和誹謗，就象今天杜勒斯对我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污蔑和誹謗一样，他們以为这样就可以削弱、乃至消除社会主义国家建設成就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事实上他們的所作所为恰恰在人民群众中更加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資產階級中某些头脑比較清醒的人物，逐漸認識到这种自欺欺人的手法是十足的愚蠢，于是有一批策士，就采取更为“巧妙的”办法，他們也打起計划經濟的幌子，認為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同样可以实行計划經濟，以此轉移人民群众的視綫，麻痹無产階級的階級意識。勞文就是这一批策士中的代表人物。所謂“計划化运动”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同这些壟断資本的策士沆瀣一气的，还有無产階級的叛徒考茨基、希法亭之流，他們提出什么“超帝国主义論”、“有組織的資本主义”等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理論，他們所干的勾当，正象今天鉄托、拉森之流一样，目的无非是企圖利用各种修正主义貨色，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招搖撞騙。这些叛徒和資產階級策士、学者一模一样，都是帝国主义壟断資本的忠实鷹犬。

勞文作为資產階級的学者，他不会承認也不可能認識他所处的时代，是資本主义已經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垂死时代，但是，他畢竟生活在这个百孔千疮的資本主义社会制度之中，只要他不閉上眼睛，他就不可能不看到資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病症。勞文的政治生涯和著述活动，正是在 1929 年資本主义經濟危机的年代开始的，他本能地意識到經濟危机是資本主义的致命伤，为了替壟断資本寻找出路，他千方百計地为資本主义献計献策，而所謂“計划化运动”就是他为壟断資本找到的一帖“良方”。因为勞文为壟断資本効力有功，也就很快受到他的主子的賞識，于是“計划化运动”在美国風行一时，好象資本主义从此可以得救了。

且来看看勞文是怎样販賣他的这一套貨色的。首先，他在現實面前不得不承認，經濟危机是資本主义社会最大的灾难，同时，为了緩和国内的階級矛盾和帝国主义集团之間的矛盾，他又不得不承認战争是另一个社会灾难。他認為消灭經濟危机和战争是二十世紀所面临的最根本的問題。應該說，勞文提出的問題确是“切中时弊”的，因为經濟危机和战争这两重灾难，正是資本主义制度的一对孿生子，要消灭这两重灾难，就必须首先消灭資本主义制度。勞文自然不会得出这个結論，他要在資本主义制度許可的范围内来寻找摆脱这两重灾难的道路，这在我們看来，无异是“緣木求魚”，可是勞文却摆出他那副資產階級学者的面孔，一本正經地在侈談他的良方妙藥。他認為把民主自由、經濟效率和社会福利結合起来，就可以消灭經濟危机、消灭战争，而結合的办法就是国家对經濟活动进行“合理的指导”，用国家計劃和国际計劃来代替放任主义和私人壟斷。拿他自己的話來說，这就是“計劃化运动”。“計劃时代”这本书就是勞文为鼓吹資本主义計劃化而写的，他从計劃种类、計劃与民主主义談起，講到美国应该如何計劃，工人和計劃的关系，以及国际計劃的作用等等。而貫串全書的一个基本論点，是通过他的所謂計劃化，資本主义社会的內在矛盾就可以得到調和，从而資本主义制度可以永世長存下去。勞文小心翼翼地撇开生产关系不談，他竭力要表明計劃化是与社会制度毫无联系的东西，似乎計劃經濟仅仅是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只要人們願意采用，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可以采用的。这就是勞文“計劃理論”的實質。

勞文所謂的民主自由，經濟效率和社会福利，以及三者的結合是些什么貨色呢？如果只看他的表面文章，我們就會被他弄得莫名其妙。其实戳穿來說，問題則是很明显的。所謂民主、自由，不

言而喻乃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也就是一小撮壟断資本家的民主和資本剝削勞動的自由，而无產者的自由則是失業、挨餓的自由；所謂經濟效率，就是在生產合理化的口號掩蓋下的泰羅制式的高度剝削率，把在業工人的勞動能力儘快地榨取盡淨，然後再從勞動後備軍中繼續填補榨取；而美其名曰社會福利的措施，則是勞文要他的主子，多掏出些殘羹剩汁來豢養一批工賊，以此從工人階級內部來破壞工人運動。至於把這三者結合起來，是一個什麼東西，則是不言自明的了。那就是繼續打着民主、自由這些幌子，來進一步剝削和壓榨工人階級的血汗，在社會福利的措施下，進一步分裂和破壞工人運動。勞文不是不知道，這些手段是資本家早就採取和實行了的，但勞文認為單個的資本集團分別採取這些對策，遠沒有通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實行統一措施更為有效，因此，他提出要把這三者更好的結合起來，就必須由國家對經濟活動實行“合理的指導”。勞文的這一套主張，實質上反映了壟断資本集團通過幾年更換一批代理人進行統治的辦法，已經不能適應資本主義的現狀，而必須由壟断資本家直接出面來把持國家事務，才能使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更好地為壟断資本服務。勞文作為壟断資本的策士，自然要為此先作一番鳴鑼開道的工作。至於勞文所謂用國家計劃代替私人壟断，不過是他用以欺騙輿論，麻痹群眾的手法而已，因為國家機器從來就是掌握在壟断資本手中的。深得主子歡心的勞文，自然明白壟断集團不會為此見責，而且這一辦法只有對壟断集團更加有利，他們可以通過政權這一工具進一步霸占和掠奪社會財富；何況勞文同時還提出要用國家計劃代替放任主義，這就更便於壟断資本除了從經濟上，更可以從政治上打擊和排擠中小資本家，以及壟断集團以外的一切競爭者，從而攫取更多的遠遠超過平均利潤以上的高額利潤。勞文如此忠心耿耿地為壟断資本

籌謀、獻策，难怪他得到主子的如許賞識和重用。

勞文的“理論”不仅为美国壟断資本在国内进一步向工人階級进攻提供了方策，而且为美帝国主义对外的擴張和侵略政策，出了不少主意。他的关于国际計劃的主張就是为这后一目的服务的，他竭力強調美国在战后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鼓吹美国是唯一能够带头实施世界“新政”的国家，大肆宣傳世界主义，要求所有国家放弃国家經濟主义，实行“国际合作”。勞文的这一套主張，不管他用了多少“合作”、“繁荣”等漂亮的詞句加以掩飾，他的赤裸裸地为美帝侵略政策服务的本質却是昭然若揭的。

勞文以为在資本主义制度腐烂的軀骸外面，套上一件計劃經濟的华丽外衣，就可以遮尽世人耳目，这只能是梦想。不用說勞文的这套騙术是十分拙劣的，就是比其勞文的騙术更加高明百倍的象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和鉄托的什么主义，在今天的全世界人民面前，也是无所施其計的了。只不过表明这班家伙的心劳日拙而已。

計劃經濟絕不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人們願意采用就可以采用的方法。实行計劃經濟的前提是生产資料公有制，实行計劃經濟的依据是社会主义的經濟規律，資本主义的生产資料私有制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是注定不能实行計劃經濟的。資本主义计划化的一切言談，不是反动的捏造，就是天真的幻想。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学者那种“病急乱投医”的狼狽相。

勞文的“計劃时代”就是这种反动捏造的代表作，从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学者是怎样为壟断資本尽忠効力的。現在把这本书作为反面教材出版，通过它，可以进一步批判和肃清資產階級学术思想在我国的影响。

前 言

劳文先生很适当地将本书命名为计划时代，他把二十世纪描写为“计划的时代”。在这里，并没有什么措词上的夸大。当世界各国人民都在离开旧的，走向新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的一个不合理的运动之中。象在我们美国自己的革命时期中一样，每一个工业国家都表现了一种新的信心，一致认为人类的理智足以应付新的情况。当国际劳工会议(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于1944年在菲勒德菲亚(Philadelphia)举行年会议时，唯一的一个被各民主国家代表所赞同，同时好象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名词，就是“计划化”。在那次会议中，虽然有些国家的代表们想用“中央集权”这个字眼来指明计划的特殊观念形态的意义，可是如众所周知，计划这个东西，只是一种技术，一种手续，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政治制度。人们可以利用计划来更贪婪地进行战争。法西斯主义可以采用计划；共产主义者可以采用计划；民主国家可以采用计划。各个工业企业和全部工业都可以采用这一技术。远在计划的实践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运动以前，远在计划的实践还没有由计划“时代”发展到计划“纪元”以前，人们就早已采用计划这一技术了。

计划时代的另一特点是适应的迅速。我们看到汽车、无线电和飞机工业在短短三十年中从一种业余事业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工业；我们看到在短促的战争时期中电子工业的飞跃发展；我们看到现代技术在这些方面的惊人的发展速度，我们就不必惊奇：计划化运动这个在十年以前只是一个刚刚被人们提出来而人们对于它

并没有抱什么希望的东西，现在居然被劳文先生这样的哲学家，充满信心地用来命名目前这个时代，将它称为计划纪元了。

我个人认为计划的萌芽是发生于1913年，这一年，威尔斯(H. G. Wells)曾经在伦敦皇家学会对于过去的事物提出了他的尖锐而肯定的挑战，“未来的发现”。威尔斯先生说道：“我相信可以建议对未来的事物作一种有系统的考察的时候，不久就会到来了。你们不能根据过去的失败来断定这种工作的现实性的太小。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企图这样做过，直到目前为止，第一流的思想家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如果过去五十年中研究社会和政治发展规律的学者的人数与研究化合的人数相等，同时对于前者所给予的注意、批评与讨论也和给予后者的注意、批评与讨论相等，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必早已获得令人满意的成就了。

“对于我这一个合理的建议，一般人在思想上是认为有困难的。不过在这个过去一百年中曾经看到科学的美满成长而且充分认识认识到科学的精神的学会(伦敦皇家学会)里，你们当然知道预见与科学研究这个概念之间从来就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一般人看来，所谓科学研究只是人们对于一些小事物的热情的、没有目的的搜集工作，如同海鸟搜集贝壳和鹅卵石把它们井井有条地排列成行的工作一样；在这种搜集过程中，有时可以偶然出现某种魔术——著名的‘科学奇迹’；至于这些奇迹怎样出现，一般人是无法了解的。在一般人心目中，一切发现都是偶然的。可是你们都知道，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主要的东西并不是事实的搜集，而是事实的分析。事实只是原料，而不是科学的实质。分析是我们一切有系统的知识的来源，你们都知道：科学过程的目的、试验与证明并不是可以出卖的魔术家的戏法，而是预见……。”

威尔斯对于预见的有效性的这一重要预言，产生在经济计划

的紀元以前。在這一事實面前，我們只能認為經濟學家與研究統計的人們沒有接受威爾斯這一提示，毫無疑問，他們相信：從現在到未來“趨勢的擴展”主要是經驗的過程，而不是預見。可是，威爾斯，這個詩人與科學家的獨特的結合者，却早已看到計劃化這種新社會沖動的萌芽了。

沒有別的人看到這一點。第一次大戰不久就發生了。威爾斯早就預料到這次戰爭中的空戰的性質，可是政治家們卻隱退到過去的时代之中。1918年的停戰是歡樂的信號，是逃避現實的信號——回到正常生活中去。甚至威爾遜(Woodrow Wilson)也拒絕組織一個委員會來研究和提出維持和平的方法。政府的顧問們都很快地離開了華盛頓；美國開始再回到原來的道路上去，在這條道路上，撒滿了1929年的危機與嗣後的經濟蕭條的種子。

這時勞文正在華盛頓，他當時是布羅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e)的主持人之一。他對於美國有深刻的認識，不過在當時那些在華盛頓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們中，他也是一個最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對於俄國、歐洲各主要國家和英國都有直接的了解，對於國際工人運動，尤其是美國的工人組織，有專門的研究，同時在經濟學方面有良好的基礎，所以學者們與學生們都歡喜和他接近，把他當作非正式的顧問。博學多聞的勞文，對於實際行動，和實行家，都有很大的興趣；同時他也象大多數的現代人物一樣，認為凡是不能用來影響生活和不能產生行動的學識，都是無用的。他的仁愛的本性，友愛的天賦，以及他對於生活的熱愛，使他很容易把人們團結在他的周圍，成為後來人們所知道的圓桌會(Round table)。他們每兩星期在布羅金斯研究所聚會一次，參加集會的有經濟學家、軍人、政府領導人、統計學家、工人領袖、歷史學家與工程師。不久他們便舉行了一系列的座談會，形成了美國正式計劃

运动的基础和背景。

1926年3月份的“电气工人杂志”(Electricity Workers Journal)用很大篇幅来分析机器生产对于人力的影响。它所提出的问题是：美国的工业是否走上了自杀之路？虽然在这以前有些专家们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可是这次却是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所提出的第一次的具有哲学意义的攻击，也是工人阶级自己为了合理解决这个问题所提出的第一个挑战性的要求。这一期杂志发行以后，它的编者曾经把它分送给五十个经济学家和工程师，请他们提意见。在编者所收到的意见中，只有一个专家——劳文博士——建议把国民经济计划当作解决问题的方法。劳文先生写道：“我觉得我们的机械发明的天才好象会把我们引到一条死路上去，除非我们学会一种控制它的本领，使它能为全人类的利益服务；同时我也觉得你们所提到的那种趋势，并不仅仅限于美国，而是具有世界性质的。因此我坚决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就是：(1)有意识的国民社会计划和(2)国际经济合作”。

据我所知道的，在美国使用国民经济计划这个名词——在它的现代的意义——还不是第一次。嗣后，由于种种情况的發生，1934年国民经济与社会计划协会(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Planning Association)便宣告成立了。除了劳文博士以外，科依尔(D. C. Coyle)、黑杰斯(M. H. Hedges)、亨利克斯(A. F. Henrichs)、帕森(H. Person)、索尔(G. Soule)等人也都当选为理事。

说来很奇怪，在最初年代里，他们完成的主要工作却是消极的。理事会对于当时流行的编制全盘计划的这一工作，竟拒绝参加。他们对于编制全盘计划的一切申请都一律拒绝。他们坚决认为计划不是绘制蓝图，计划只是接触问题的一种方法、一种技术、一种促使没有变化的思想适应正在迅速变化中的客观情况的努力。

初期的理事会也坚决反对从这个协会的名称中删去“计划”二字的建議。由于理事們具有傳統美国式的个人主义思想，他們不肯承認计划是屬於俄国独有的东西。我們当时相信，如同我們現在还是相信一样：美国共和国就是从计划技术中产生出来的。

计划提供一种机会，使得我們可以做一些工作来解决民主主义的最麻煩的問題；这个問題就是各經濟集团之間長期的意見不和。同階級斗争作斗争是任何一个共和国的經常性工作。这个問題决定着美国在国际秩序中能否維持它的地位，能否在它国内进行經常的战斗。

本書中劳文博士的論文，有些是在美国计划化运动萌芽时期中發表的。这些文章大部分写于计划化运动正在摸索前进，计划化思想正处于占优势的地位，討論很热烈，各种不同观点的爭执正在啓發人們的智慧的年代里。这个时期的成績提供了一种基础，使得人們在最近三年中能够完成一些較為实际的工作：商人、农民和工人都在努力寻求有关可以在战后采用的计划的一致意見。这个动荡时期的特点就是哲学家变成了活动家，甚至变成了政治家。

虽然劳文这一类的思想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开辟道路的工作，据我看来，美国恐怕还是不会在计划的基础上对待战后的重要問題的。不管怎么样，現在已經有足够的事实証明：劳文同他的伙伴們所創始的计划化运动对于美国事物的进展已經产生了影响，并且我們有理由相信：不管将来的結果是成功或失敗，计划作为一种技术，必会在美国政治家的活动方面繼續發生重要影响。计划已經掌握了人們的想象。一般的人現在都已經知道政治家的决策可以影响他們和他們家庭的日常生活。哲学可以烘出面包来。人們正在要求政治家利用科学的每一工具，使他們的决策成为社会的正确决策；在这一目的沒有达到以前，人們是不会罢手

的。在那个未来的时代中，象劳文这一类创始人的伟大的启蒙功績是会被人們記憶着的。

黑杰斯 (M. H. Hedges)

电气工人国际联谊会研究主任

序 文

本書涉及長約十四年的一个时期：从經濟大蕭条开始到第二次大战止，这个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和最悲慘的时期之一。書中論文有些是 1931 年到 1933 年經濟大蕭条年代中写成的。最近的几篇論文是在 1941 年到 1944 年战争期中写成的。各章大部分曾以杂志論文或小册子的形式發表过，这一部分經過編輯上的一些修改后，在本書中再度与讀者見面。書中也有几章是前此从未發表过的。曾經發表过的那几章，其發表時間及地点，我将另外加以說明。

然而，在範圍和精神上，這本書并不是一部沒有系統的論文集。它是一本完整的書，意思就是說：它有一个內在的統一性。这个統一性可以从標題的編排，叙述的方法以及貫串全書各章的观点方面表現出来。

这个內在的統一性是从下面这个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即：書中各章是从各种不同方面来探討同一問題，同时又从各个不同角度归結到同一答案。討論的問題是：在二十世紀的新技术和新智慧条件下，怎样能使民主主义自由、經濟效率与社会福利三者熔成一体，来消灭現存两大灾害——經濟蕭条与战争呢？我們所探寻的答案是要通过經濟活动的合理社会指导来解决这一問題，也就是要采用国家的和國際的民主計劃代替放任政策和私人壟断来解决这一問題。

現在，計劃这个东西，在英国和新西兰这一类民主国家，已經取得了国家政策的地位；甚至在美国，人們也承認它是一种合法

的公众厭物，这种厭物可能变成具有公众价值的东西。在 1931 到 1932 年間，无疑的，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计划只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工具”，同美国的傳統与制度是完全不相适合的。几年以后，当希特勒取得德国政权时，美国人又把计划同納粹主义等同起来，同“总体主义”等同起来了。

因此，对于那些把计划当作解决經濟蕭条的一种方法的人們來說，他們的第一个历史任务就是說明计划的真正的意义，說明它怎样能够在民主国家見諸实行，說明在哪种程度上它是美国历史本身的一种产物。从 1931 年起，本書作者——当时是布罗金斯研究所負責人之一——就在华盛顿組織了一个团体来討論这些問題。这个团体的名称是經濟计划討論会 (Economic Planning Discussion Group)，定期举行非正式的討論，一直进行了几年，参加討論的人有經濟学家、国會議員、貿易协会的主持人、海陆軍人、工人領袖、政客和政治家。当时摆在公众面前的一些计划，以及提交美国国会的一些有关新政 (New Deal) 的建議，我們都討論过。

从这个团体的會議中，产生了組織比較永久的正式的机构的要求。1934 年 12 月由于本書作者的發起，組成了国民經济与社会计划协会，會員不久就發展到三百多人，其中有著名的經濟学家、工程师、商人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人士。协会的理事有索尔、帕森、科依尔、亨利克斯、黑杰斯等人，由作者本人任理事長。协会成立以后立刻就办了一个月刊——“计划时代” (The Plan Age)——由理事会負責領導它的編輯工作。

本書前四編中，有几章就是在这几年中写成的，有的是为“计划时代”写的，有的是为其他刊物写的。这几章的内容有一种历史的意义：它們反映了当时为数不算太少的美国人的思想情况，追溯了本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的計劃化运动的起源。不过我在本書中

并不是仅仅把它们当作历史资料来发表的。实际的情况是：在过去十年中，关于计划化的著作虽然是一天一天地在增加着，可是在国民经济计划的经济和政治的基础方面还是缺少有系统的分析。作者认为在这种意义上，也就是在弥补这一缺点上，上述各章是有其一定的价值的。

当经济大萧条一发生时，人们便已看出来，它的根源与发生的原因都是具有世界性质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采取国际行动。1931年8月，著名的荷兰阿姆斯特登的殖民学会（Colonial Institute）举行了一次世界社会经济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包括苏联在内的二十六个国家的三百个代表。这次会议是由美国社会调查专家克尼克（M. V. Kleek）与荷兰社会调查专家佛烈德拉斯（M. Fledderus）领导的国际工业关系学会（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Institute）召集的。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富裕中的贫穷这个矛盾”。会议研究了通过国家与国际计划来解决这个矛盾的可能性，并建议组织一个全世界的社会经济机构来研究这个问题。

不久英国放弃了金本位。一年多以后，1933年夏天，罗斯佛总统提议召开的伦敦货币经济会议（London Monetary and Economic Conference）也寿终正寝。这次会议的失败（以及1932年裁军会议的失败），为经济国家主义和它的孪生兄弟国家帝国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这样一来，在1931到1933年这个时期里，人们在日常讨论中便把国内问题和一些具有国际性质的问题结合起来了。在阿姆斯特登的会议中，作者是发言人之一；后来作者又在美国作过几次公开講演：一方面说明伦敦会议的意义，一方面指出经济国家主义的危险性。当1935年作者以国际劳工局（International Labour